

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案例分析

黄 扬 李伟权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目的/意义]对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进行剖析既能为网络环境下的政策研究提供可行的研究视角,也能为我国共享经济领域监管政策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以2018年以来的多起网约车舆情事件和新出台的规制政策为研究案例,对网络舆情与规制政策变迁的关联机制进行全景式剖析。[结果/结论]研究表明:在网络舆情推动下,焦点事件的舆情动员与多起事件的叠加效应、以大数据形式所呈现的指标变动推动了问题源流的构建;经网络舆情放大后的专家学者政策倡议和网络意见领袖引导下的政策偏好则构成了政策源流;在网络圈群和聚合效应下形成的国民情绪、政民舆情互动后的政府态度则推动了政治源流的形成。最终,政治之窗与问题之窗的同时开启为三流耦合创造了机会,政策企业家也把握契机推动了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变迁。

关键词 网络舆情 舆情事件 共享经济 网约车 政策变迁 多源流理论

中图分类号 D035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8)08-0084-08

引用格式 黄 扬,李伟权.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J].情报杂志,2018,37(8):84-91.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8.08.014

The Logic of Car-hailing Regulation Policy Chang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Multiple-stream Theory

Huang Yang Li Wei-q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arrying out an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car-hailing regulation policy chang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a feasibl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olicy-making of sharing economy.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stream theory, taking cases of the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the new regulation policy since 2018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carried out a panoramic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mechanis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regulation policy change.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focus events and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multiple events and indicators change in the form of big data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blem stream. An enlarged policy initiative from experts and the guidance from Internet opinion leaders has formed the policy stream. The national mood formed under the group effect and the aggregation effect and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af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opinion has formed the political stream. Finally, the simultaneous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window and the problem window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three stream coupling. Policy entrepreneurs have also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car-hailing regulation policy change.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events sharing economy car-hailing policy change multiple-stream theory

收稿日期:2018-06-01

修回日期:2018-07-12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智库课题“广州市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018GZZK0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传播公众逆反心理预防预警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15A030313318)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 扬(ORCID:0000-0002-9372-2015),男,1994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治理与公共政策;李伟权(ORCID:0000-0002-9978-6095),男,1974年生,副院长,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治理与公共政策。

通信作者:黄 扬

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当前,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方兴未艾^[1]。然而,面对共享经济这一新兴业态,相关政策体系的缺失也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频频发生^[2],而伴随着相关网络舆情事件的推动,我国共享经济领域的监管政策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善。例如,网约车乘客安全舆情事件便推动着相关规制政策的变迁^[3]。但是,目前国内仍鲜有学者针对网络舆情与共享经济监管政策之间的关联机制展开研究。因此,本研究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出发,以2018年以来的多起网约车舆情事件和新出台的网约车规制政策为研究案例,对网络舆情与网约车规制政策出台的内在关联机制进行全景剖析,从而对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进行有效归纳。一方面,本研究为网络环境下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分析视角,另一方面,也能为我国共享经济领域监管政策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进而促进网络综合治理政策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1 文献回顾

1.1 网约车的监管与规制 网约车作为我国共享经济的典型产业,不仅有利于培育新兴业态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为民众出行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然而,解决了“打车难题”后,“监管与规制难题”也随之而来^[4]。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对网约车的监管与规制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学者对我国网约车规制的合理性、规制途径和规制主体进行了学理性探讨,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网约车行业进行规制,并且要建构一个平等和动态的规制体系,同时,规制立法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分工^[5]。当然,政府在网约车行业的监管与规制上也应把握合理性原则和适度原则,因此,有学者立足于规制政策的成本收益视角,对地方的网约车规制政策的政策成本和政策收益进行测算,以寻找适合网约车行业的规制模式^[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借鉴美国的网约车监管经验来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网约车政策,例如,明确网约车企业的承运人定位,将其放置到规制体系里,要求其必须为乘客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并承担与运营业务相对应的法律责任^[7]。

1.2 政策变迁中的多源流理论引入 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所提出的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变迁分析的经典理论。事实上,该理论正是对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和政策何以发生变迁的回答,对此,金

登借助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进行解释^[8]。政策的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往往以社会指标的变动、焦点事件的发生以及现行政策的运行反馈(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反馈)来体现和构建,政策问题的识别与界定对于最终的政策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主要聚焦于政策共同体所产生的政策备选方案、政策倡议和问题解决途径,政策共同体实质上包含了专家学者、职业官僚、利益集团分析人员以及社会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政策方案的形成与选择对于政策变迁也至关重要;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政策变迁,国民情绪变化、政党理念、政府变更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都构成了政治源流,其对于公共部门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在多源流框架中,这三条源流是相对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流经路径,只有当某些紧要问题发生并备受关注(即问题之窗)或政策问题与政治气候相契合时(即政治之窗),这三大源流才会相互交融与耦合,同时,在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三大源流融合的产品会进入打开着的政策之窗(既可以是政策之窗或政治之窗,也可以是两者同时开启),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的变迁(理论的解释逻辑见图1)。也就是说,政策之窗为问题、政治和政策源流三者的完美融合提供了机会,也为三者的融合物进入政策议程和推动政策变迁创造了条件。当然,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非常有限,不会一直存在,必须紧紧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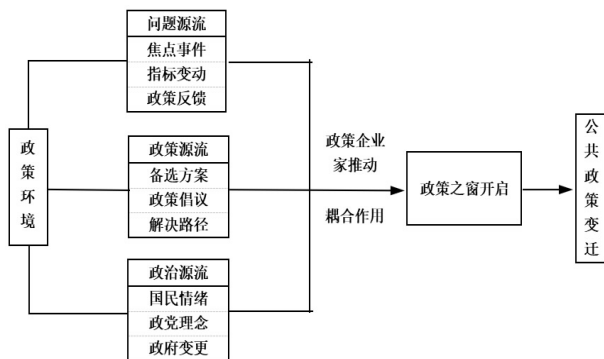


图1 多源流理论框架的解释逻辑

1.3 网络舆情研究中多源流理论的适用 由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普遍的适用性,多源流理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西方学者也将其广泛应用于社会保障^[9]、税收政策^[10]、城市应急^[11]等领域的政策分析当中。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城市住房^[12]、公共交通^[13]、文化服务^[14]等领域的政策研究当中引入了多源流框架,这也反映出多源流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政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共政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策场域当中,网络舆情也对公共政策决策具有推动作用^[15],而多源流理论在网络舆情环境下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首先,焦点事件和

2.2.2 指标变化:数据反馈与问题感知 正如约翰·金登所言,社会系统中重要的指标变化往往预示着社会问题的出现及其严重程度,因此,重要指标的变动也往往能够引发公共决策部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推动问题源流的形成与政策问题的识别。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科学的发展,反映社会问题的涉及范围及其严重程度的指标往往能够通过大数据的形式来进行呈现^[19]。同样的,在网络化的背景下,网约车乘客安全问题也能够通过相关舆情事件的大数据来进行反映。一方面,借助网约车各项舆情数据的绝对数值(如媒体报道数、微博发

帖数与评论数、百度搜索数等),公共决策部门能够更为直观、迅速地感知相关问题的涉及范围和关注程度。另一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能借助大数据短时间内的变化幅度加以呈现,例如,“郑州空姐打车遇害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内,相关的新浪微指数(见图 3)和百度搜索指数(见图 4)便迅速攀升并达到峰值,相关数据的急剧增长也充分反映出网络舆情推动下网约车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网络环境下舆情指标的数据变动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社会问题的数据反馈与直观感知,并推动了网约车监管与规制的问题源流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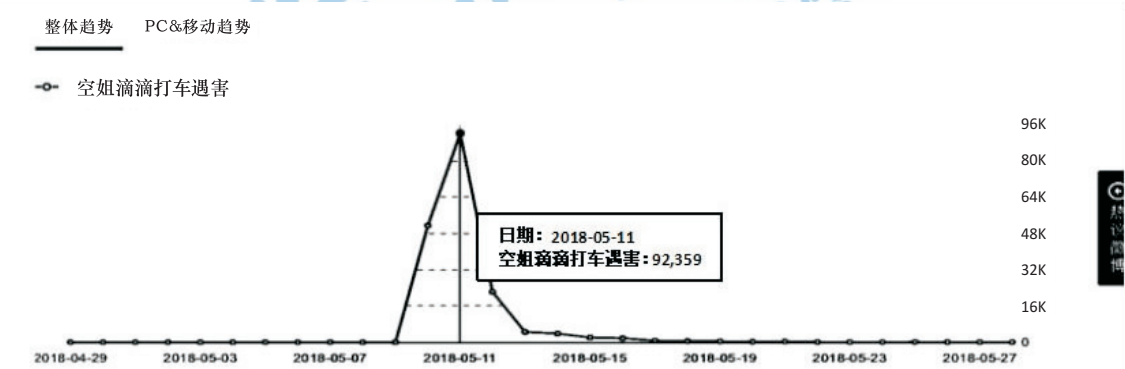


图 3 “空姐打车遇害案”新浪微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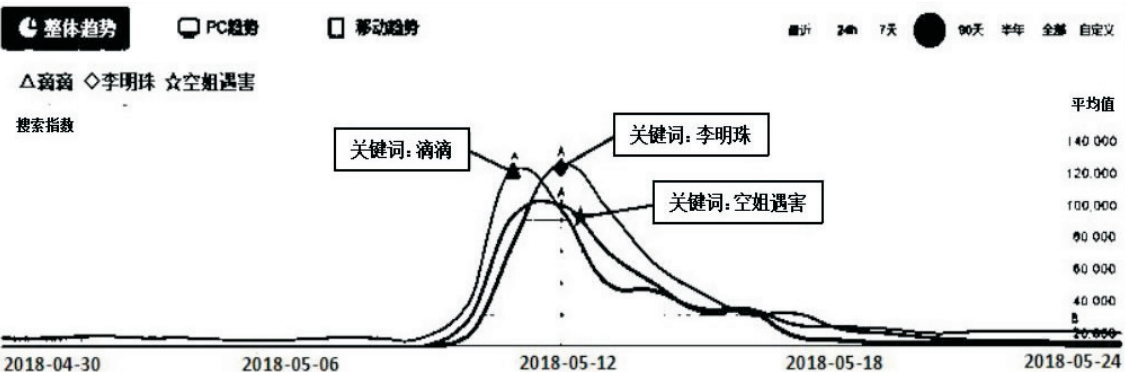


图 4 “空姐打车遇害案”百度热词搜索指数

2.3 政策源流

2.3.1 专家学者:网络舆情的放大效应 专家学者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和社会声誉使得他们在政策方案的形成和选择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能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媒体访谈、智库论坛等形式提出相应的政策倡议。在网络化背景下,专家学者的政策倡议还能通过网络平台加以传播,进而在网络舆情的放大效应作用下实现声音的扩大。在网约车舆情事件中,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网约车规制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倡议(见表 2),他们有的通过接受新闻网站的访谈提出见解,如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时便提出了“加强政企合作,提升监管能力,树立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约束车辆和司机的理念,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政策建议,并得到

了众多新媒体平台和网友的关注和传播。此外,叶赞平、张效羽、赵占领等诸多专家学者也都通过网易新闻等互联网媒体的采访提出自己的政策见解。同时,不少专家学者还借助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平台发表自己对网约车规制的政策建议,事实上,网络平台作为舆论的放大器^[20],其细分化、关联式、圈群式的舆情传播模式,也使得专家学者关于网约车监管的政策倡议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得到转载、转发,实现了声音的增强和扩大,进而也提升了政策倡议的社会影响力。

2.3.2 意见领袖:政策偏好的引导效应 尽管网络的普及和各类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得广大网民能够便捷地在网络平台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但是,普通网友通常只能起到局部或相对有限的影响。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来自各行各业的网络意见领

袖则处于网络意见表达和传递的关键节点上,他们能够借助对焦点事件的舆论表达,触发网民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21],并对网络舆论导向和价值偏好进行筛选、过滤、深化和传播,进而对网络舆情产生引导效应^[22]。在网约车安全的网络舆情中,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网络意见领袖(如“微博大V”、知名微信公众号、网络社区达人等)也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平台,紧紧围绕网约车舆情事件,表达自身对网约车监管和规制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偏好,例如,完善网约

车司机的行业准入机制、加大网约车平台于司机失信的惩治力度、强化网约车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部分意见领袖的政策观点见表3),并触发广大网友的网络集群行为,例如网友对网络意见领袖政策观点的围观、点赞、评论与转发,进而也对网约车舆情中的政策偏好起到引导效应,使得强化司机从业审核、强化网约车企业责任、提升网约车服务质量等政策偏好得到广泛传播和进一步强化。

表 2 新媒体平台上专家学者政策倡议一览表

首发平台	专家学者	社会身份	时间	主要观点	转载平台
中国经济网	蔡继明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2018-03-02	树立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约束车辆和司机的理念,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新闻网站 微博 微信
法治周末	张效羽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2018-04-18	政府要对网约车运营中的具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借助大数据创新监管方式	新闻网站 微博
网易新闻	赵占领	知名 IT 及知识产权律师	2018-05-12	网约车平台应积极承担责任,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减少恶性事件	新闻网站 微博
中青在线	叶赞平	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	2018-03-22	应运用网络技术,结合网约车行业特点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新闻网站 微博 微信
新浪微博	雷家茂	知名律师	2018-05-13	相关部门要重视网约车司机的监管、考核、退出机制的构建	微博
新浪微博	王海	知名法律从业者	2018-05-10	政府应采取规制措施,要求网约车平台或行业协会强化审查司机背景以及年检	微博

表 3 新浪微博上意见领袖政策观点一览表

微博昵称	社会身份	发帖时间	主要观点	粉丝数
@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2018-05-11	尽管滴滴与司机之间属于居间服务关系,但应承担信息审查义务	416 万
@ 石述思	知名时评人	2018-05-11	完善网约车监管事宜要及时跟进,要从根本上提升网约车服务质量	203 万
@ 陈志林	畅销书作家	2018-05-11	应要求滴滴平台停业整顿,完善网约车司机的行业准入机制	113 万
@ 凤息神泪	知名漫画家	2018-05-13	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网约车的筛查审核和监管力度	84 万
@ 周成洋 CY	时政评论员	2018-04-24	网约车平台在监管上仍不到位,应提升网约车监管水平,避免被钻漏洞	59 万
@ 韩东言	法律评论人	2018-05-11	共享经济存在盲目扩张而忽略基本审查的问题,应加强监管排除隐患	56 万

2.4 政治源流

2.4.1 国民情绪:网络圈群与聚合效应 在政治源流当中,国民情绪是促进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与政策变迁的有力推动因素,因为国民情绪的形成意味着公众就某一社会问题或政策领域朝着一致的方向思考,即广大民众对于问题的态度达成一致。在网络空间中,网络舆情的圈群效应正好为国民情绪的凝聚和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在“空姐打车遇害案”的舆情事件中,尽管众多网友与受害者之间并无真实社会身份上的直接联系,然而,借助于微博、博客、问答平台等新媒体渠道,网友们突破了原有社会关系的限制^[23],并围绕着网约车的行业规范、平台责任、政府监管、乘客权益、女性自我保护等话题,形成了话题讨论

型的临时性网络圈群(见表4),伴随着网络圈群话题讨论的深化,网友们对网约车监管和规制问题的看法与态度也逐渐变得一致化。与此同时,网络平台还有助于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舆情聚合(见表5),在网约车舆情事件演变过程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对彼此挖掘的舆情事件信息和舆情动态不断进行聚合,例如,《北京日报》在2018年5月11日刊发了题为《网约车安全问题再成焦点》,指出网约车平台应强化司机从业审核,该文章观点很快得到光明网、搜狐网等新媒体平台的大量转载,这个过程也推动了公众对网约车规制问题形成更为一致而深入的认知,并加速了强化网约车监管的国民情绪的形成。

表 4 “空姐打车遇害案”中的部分网络圈群

圈群平台	圈群话题	网友昵称	时间	主要观点
新浪微博	自我保护	柔然_敏莲	2018-05-12	女性独自乘网约车谨记“财不外露”,可在车上把方位发给朋友,避免与陌生人拼车
知乎	自我保护	李二白	2018-05-11	女性乘坐网约车时,应注意防患于未然,要提高警惕,稍有不对,立刻报警
新浪博客	政府监管	jx 天行健	2018-05-11	相关部门要担负起监管职能,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制度,甚至不妨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各类平台的引导和追责。
天涯社区	政府监管	香港记者 oo	2018-05-17	政府可将监管的目光多放在共享经济服务平台上,使其真正地“服务群众、便利群众”
凯迪社区	平台责任	伍月山	2018-05-11	网约车公司必须强化安全措施,严格审查滴滴车司机资格
知乎	平台责任	刘京成	2018-05-11	网约车平台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加强对司机的审核,提供安全、有效的约车服务

表 5 “空姐打车遇害案”中的媒体舆情聚合

媒体类别	媒体名称	时间	舆论视角	主要观点
传统媒体	求是杂志	2018-05-11	规制政策与监管缺失	对人车,监管措施都不能缺位,监管到位方能保障安全
新媒体	四川在线—天府评论	2018-05-13	规制政策与监管缺失	从空姐的不幸遇害,更该反思当前网约车监管政策的缺憾
传统媒体	北京日报	2018-05-11	司机从业资格审核	生命陨落令人痛心,网约车司机资质问题不容忽视,应强化司机从业审核
新媒体	头条博客微博认证号	2018-05-11	司机从业资格审核	当前滴滴对顺风车司机审核仍相对宽松,安全问题突出
新媒体	澎湃新闻微博认证号	2018-05-14	网约车企业责任承担	司机是代表滴滴公司履行承运合同行为,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滴滴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传统媒体	中国妇女报	2018-05-23	网约车企业责任承担	安全管理和保障义务是居间服务的重要义务,如未尽到相关义务,则应承担法律责任

2.4.2 政府态度:政民互动与共识构建 政府部门对于政策问题的认知、理念和态度的变化促成了政策变迁^[24],而政民合理互动则有助于彼此就政策问题形成共识。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明确了政府部门对政务网络舆情的回应责任。同时,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与发展,政民之间的舆情互动也不断增加。在网约车安全舆情的传播与演化过程中,一方面,交通部、公安部等政府部门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政务新媒体平台^[25],就网约车规制问题与公众进行积极互动和交流(见表 6),例如,交通部针对 2018 年以来的多起网约车安全舆情事件,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相继发表《交通运输新业态不是“法外之地”》《检验网约车发展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等文章,对网约车服务质量、责任承担、非法运营、监管漏洞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这些文章也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评论和转发,以及其他媒体的转载和报道,例如,仅《交通运输新业态不是“法外之地”》一文的阅读量就高于 2.5 万次。另一方面,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同样也借助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与网友积极互动,其中,多篇微信推文的阅读量突破了 10 万次,并得到诸多网友的点赞和转发。可见,网约车事件中政民积极的舆情互动也促成了对于网约车规制问题的共识构建。

表 6 新媒体平台上的政民互动情况

新媒体平台	发布时间	发文标题	阅读量	转发量	点赞量
交通部微信公众号	2018-05-07	《交通运输新业态不是“法外之地”》	25300	—	32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2018-05-16	《赶紧打开滴滴上面这个功能,尤其是女生!》	—	9975	16836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2018-05-14	《害死空姐的他,怎么当上滴滴司机的?》	—	4593	8818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2018-04-05	《一月增三家,网约车又成为“香饽饽”? 别有了市场就“变脸”!》	100000+	—	1016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2018-05-16	《滴滴公布整改措施 平台责任需落实到位》	100000+	—	2323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2018-02-27	《那辆网约车! 千万别坐!》	100000+	—	2399

2.5 多源流耦合:政治之窗与问题之窗的开启 一扇打开的政策之窗为三条源流的交汇与耦合创造了机会,也为政策企业家推动三大源流融合物进入政策议程提供了最佳契机^[26]。实际上,在三大源流形成的同时,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的政治之窗和问题之窗也同时开启,一方面,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27]。可见,包括网约车在内的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问题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同时,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网约车等共享经济领域的治理政策显然也是网络综合治理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环境也为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出台和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正如金登所言,促使政策之窗开启的原因不只限于政治源流的变化,一个使公共决策者感到压力和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推动政策之窗打开的关键。而连续发生的一系列网约车乘客安全舆情事件正是触发问题之窗开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2018年5月份发生的“郑州空姐打车遇害事件”,更是彻底触发了网约车安全舆情的爆发,同时,在新媒体等网络传播渠道的推动下,与之紧密相关的政府规制力度、网约车企业法律责任、司机从业资格把关等问题也在短时间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并使得这一原本属于个人和家庭的网约车犯罪悲剧在网络舆情的推动下上升为带有公共性质和行业性质的政策问题,从而促发了问题之窗的开启,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政策之窗的开启推动了网约车规制问题三大源流的交汇与耦合,而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在内的政策企业家也积极抓住政策之窗开启的契机,通过提案、研究报告、媒体传播等多种途径推动网约车规制问题进入政策议程^[28],例如,2018年全国两会上,就有3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对网约车监管立法的议案,而政策企业家们的推动也最终促使了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变迁。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综合上文对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过程的分析,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见图5)可归纳如下:在网络舆情环境中,焦点事件的舆情动员与多起事件的叠加效应、以大数据形式所呈现的指标变动推动了问题源流的构建;经网络舆

情放大后的专家学者政策倡议、网络意见领袖对公众政策偏好的引导则构成了网约车规制问题的政策源流;在网络圈群和聚合效应下凝聚形成的国民情绪、政民舆情互动后的政府态度则推动了政治源流的形成。在三大源流形成的同时,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的政治之窗和问题之窗也同时开启,为三大源流的交汇和耦合创造了机会,政策企业家也抓住政策之窗开启的契机,推动了网约车规制政策议程的设置,进而实现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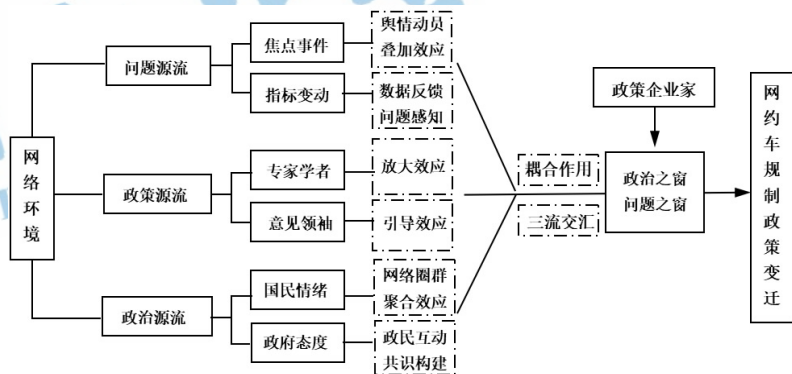


图5 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

3.2 讨论与展望 在当今网络环境下,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并通过互联网渠道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提供更为稳定的、规范的、有序的参与平台,从而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做到“咨諏善道、察纳雅言”,依法提升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舆情回应式的政策变迁受公众政策偏好和政策倾向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公众政策偏好实质上容易随舆情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波动^[29],因此,政府部门在积极回应网络舆情和民众需求的同时,也应把握适度原则,充分保证公共政策决策的自主性和科学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从网络舆情演化机理和多源流理论特征的角度分析了该理论框架在舆情研究中的适用性,但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言,没有任何一种公共行政学的原则能够完全契合不同国家的情境,因为任何理论都无法摆脱相应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作用^[30]。而多源流理论源于美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实践,在引入时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在将其引入到中国情境的分析时,应注意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学习借鉴西方经验,但绝不能盲目照搬照套”的指导思想,对理论进行适当的调适。本研究正是充分结合我国网络舆情的实际特征与政策出台的实践经验,对多源流理论框架进行了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合理修正与调整,从而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此外,尽管本研究对舆情推动下的网约车规制政策变迁逻辑进行了有效归纳,为共享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

但后续研究仍可从增加舆情案例、开展量化分析、扩展政策分析领域等方面对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林教授对本研究的启发,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1] 刘根荣. 共享经济:传统经济模式的颠覆者[J]. 经济学家, 2017(5): 97-104.
- [2] 彭 岳.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J]. 行政法学研究, 2016(1): 117-131.
- [3] 新华网.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司机无证上岗或被列入失信黑名单[EB/OL]. [2018-05-18].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2/c_1122821143.htm.
- [4] 马 亮,李延伟. 政府如何监管共享经济:中国城市网约车政策的实证研究[J]. 电子政务, 2018(4): 9-20.
- [5] 陈越峰. “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J]. 法学家, 2017(1): 17-31.
- [6] 宋心然,张效羽. 网约车地方规制细则成本收益分析——以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为例[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5): 123-130.
- [7] 楼秋然. 美国法上的网约车监管理论与实践——兼评七部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J]. 政治与法律, 2017(10): 100-112.
- [8] 约翰·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45-153.
- [9] J Blankenau. The fate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streams explanation[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1, 29(1): 38-55.
- [10] SL Mosier. Cookies candy, and coke: examining state sugar-sweetened-beverage tax policy from a 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18(1): 93-120.
- [11] D Henstra. Explaining local policy choices: A multiple streams analysis of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J].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 53(2): 241-258.
- [12] 柏必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4): 76-85.
- [13] 魏淑艳,孙 峰.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以出租车改革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2): 1-13.
- [14] 黄 扬,刘小捷.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例[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8(3): 10-15.
- [15] 刘泽照,张厚鼎.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回应行为研究——以人民网为例[J]. 情报杂志, 2013, 32(10): 13-17.
- [16] 人民网. 交通部就建立网约车“黑名单”征求意见 涉及六类行为[EB/OL]. [2018-05-2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512/c1004-29984338.html>.
- [17] 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莱恩·琼斯. 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0-28.
- [18] 郭小安. 网络舆情联想叠加的基本模式及反思——基于相关案例的综合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10): 123-130.
- [19] 张 楠. 公共衍生大数据分析与政府决策过程重构:理论演进与研究展望[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0): 19-24.
- [20] 祝 阳,雷 莹. 网络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研究——基于公共卫生事件[J]. 现代情报, 2016(8): 14-20.
- [21] 青 平,张 莹,涂 铭,等. 网络意见领袖动员方式对网络集群行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的实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7): 109-120.
- [22] 陈福集,陈 婷. 舆情突发事件演化探析——基于意见领袖引导作用视角[J]. 情报资料工作, 2015, 36(2): 23-28.
- [23] 王 阳,张 攀. 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83-88.
- [24] 刘伟伟. 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基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经验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7: 128-129.
- [25] 陈 强,曾润喜. 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中国政务新媒体研究的议题与路向[J]. 情报杂志, 2017, 36(4): 141-145.
- [26] 赵德余. 政策制定中多源流因素交互作用机制及其动态不稳定性——美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改革的经验[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4): 44-55.
- [27] 人民网. 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 八次提到互联网[EB/OL]. [2018-05-20].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018/c120837-29594814.html>.
- [28] 搜狐网. 2018年全国两会关于网约车的提案和建议[EB/OL]. [2018-05-20]. https://www.sohu.com/a/225615718_100102266.
- [29] 赵 静,薛 澜.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7(3): 42-51.
- [30] 胡 琦,胡 静. 论罗伯特·达尔的政治理论及其社会价值[J]. 求索, 2012(9): 217-219.

(责编:王平军;校对:刘武英)